

土堆之下，何以“安邱”？

——从“中华商代第一窑”到岳石文化“安邱类型”的考古实证



安邱垆堆遗址全国重点石碑

在菏泽市鲁西新区佃户屯街道曹楼村东南、龙山路东端路北，矗立着一处古朴土丘，名曰“安邱垆堆”。遗址东西长77米，南北宽71.4米，高约3米，四壁陡立，顶部略呈椭圆形。丘顶建有一座前出厦的五间砖瓦房，坐北朝南，人称“安邱寺”。在寻常路人眼中，这里只是一座普通土堆，考古学界却在此发掘出距今4500多年的厚重文明记忆。

垆堆南侧立有文保石碑，碑身镌刻“安邱垆堆遗址”六个大字，上方标注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，下方依次镌刻公布信息与立碑单位及日期。垆堆南侧铺设砖砌过道，两侧设有宣传栏，清晰展示遗址概况、发掘历程与研究成果，让参观者直观了解这座古遗址的深厚底蕴。

安邱垆堆于1957年菏泽地区文物普查中首次发现。1963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到此开展重点调查。1969年，曹楼村村民修渠时意外挖出古代房基与遗物，引发文保部门重视，省博物馆专家前来开展首次试掘。1976年，菏泽地区文物管理站完成第二次试掘。1977年，该遗址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1984年，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教授带队，联合本地文保机构开展正式发掘。此次发掘取得重大成果，探明遗址留存龙山文化、岳石文化、早商文化、晚商文化四层完整叠压的文化遗存，堆积厚度超过4米。作为鲁西南地区罕见的多时代连续文

化堆积遗址，安邱垆堆为梳理黄河中下游古文明发展序列，提供了关键考古依据。

安邱垆堆是佐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实物遗存，其中岳石文化遗存的发现，填补了鲁西南地区夏代考古空白。2001年，安邱垆堆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成为当年菏泽首个国家级文保单位。2009年，菏泽市专门设立安邱垆堆文物保护单位，实现遗址专业化、常态化保护。

近年来，当地持续推进遗址保护利用工作。2014年，国家文物局批复遗址保护展示工程；2020年，一期工程顺利实施，完成本体保护、围栏、道路、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；2021年，安邱垆堆遗址成功入选“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”，千年古遗址正式走进大众视野，成为彰显菏泽文脉底蕴的文化地标。

菏泽地处黄河冲积平原，古时水系密布、泽泊遍布，水患频发，是典型的黄泛区。为躲避洪水侵袭，上古先民择高地筑台聚居，历经千年洪水淤积、世代营建，逐步形成独具鲁西南地域特色的垆堆地貌。这种“水来登高、水退垦土”的居住模式，是先民顺应自然、抗争灾害的生动见证，蕴藏着古老的生存智慧。

安邱垆堆是鲁西南垆堆遗址中的代表性遗存，地层留存清晰完整的文化年轮，完整记录了原始社会末期至商代晚期近1500年的人类活动轨



迹。层层叠压的文化遗存，如同一本大地史书，镌刻着远古先民的生活印记，承载着绵延不绝的地域文明。

距今4500年的龙山文化层留存多座布局规整的远古房址，房址夯筑工艺成熟，配套灰坑、灰沟遗迹齐全；出土蚌器、石器、骨器、陶器等各类器物，器型丰富，工艺古朴，真实还原了新石器时代先民的生产生活场景，现存文物均珍藏于菏泽市博物馆。

距今3500年至3950年的岳石文化层，补齐了鲁西南夏代考古断层，拓展了山东地区岳石文化分布范围。学界依托此处遗存确立的“安邱类型”，为研究夏夷文化分界、中华早期文明融合发展，提供了珍贵的考古支撑。

商代文化层留存早商至晚商连续堆积遗存，稀缺难得。遗址发现的商代陶窑，被誉为“中华商代第一窑”，出土陶器工艺精湛。同时发现的早期祭祀相关遗迹，为研究商代社会习俗、手工业发展、礼制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；岳石文化与商文化的层层更迭，清晰印证了上古东夷族群与商族交融共生的历史进程，见证了黄河流域文明的演进



▲菏泽市博物馆展厅中，陈列有安邱垆堆发掘出土的部分文物

◀安邱垆堆文化宣传栏

与发展。

安邱垆堆之名源自丘顶古刹安邱寺。该寺始建于南北朝，历史悠久、香火绵长，后于“文革”时期拆除。当地流传的古人壮士除虎、建寺安民的传说，世代流传至今，赋予这片古遗址浓厚的人文温度。20世纪90年代，村民集资重建安邱寺，延续千年人文脉络。

“安邱”二字，既是先民避水安居的高地，也寄托着古人对安宁太平生活的美好期许。古寺与古遗址交叠共生，自然地貌、远古文明与人文信仰相融相通。如今登临垆堆之上，远古文明气息与当下烟火意蕴交融，诉说着千年岁月的沧桑变迁，彰显着黄河文明生生不息的蓬勃生命力。

文/图 邓文献



古寺留存千年韵 两代君王一段缘

寺院，是尘世中的一方净土，是心灵得以栖息的港湾。它隐匿于山野、静立一隅，以独特的建筑形制与深厚文化底蕴，诉说岁月沧桑与静谧禅意。

“拉马寺”，又名普贤院，始建于唐贞观七年(633)，初名宝盟寺，距今约1400年历史，坐落于郓城县杨庄集镇后刘庄村北，是郓城知名古迹、鲁西南著名古刹。

踏入千年古刹，风雨淬炼的红墙黄瓦古朴庄重，寺内大佛威仪依旧，沉淀着岁月荣光，静静诉说康熙赐银、乾隆赐名的传奇过往。

据民间记载，清代康熙皇帝曾在宫中小憩，梦见一名僧人怀抱孩童直入大殿，行至御前将婴儿安放龙榻后悄然离去。康熙诧异之际猛然惊醒，恰逢宫女前来报喜，宫中诞下皇子、母子平安。

康熙龙颜大悦，下令宫中连演三日大戏，宴请王公大臣、封赏侍从人员，随即派人四处寻访梦中古寺。历时半年，寻访人员在杨庄集镇后刘庄寻得宝盟寺。康熙下旨拨付白银千两修缮寺院，自此宝盟寺声名远扬，各地善男信女、往来香客络绎不绝。

半个多世纪后的乾隆年间，乾隆皇帝微服私访途经此地，行至宝盟寺东侧小河边。策马渡河时，马匹突然失蹄，险些落水。恰逢宝盟寺高僧元实路过，不顾安危死死拉住马缰，扶住皇帝，助其化险为夷。

乾隆随法师入寺休憩三日。古寺殿宇恢弘，环境清幽，远离俗世喧嚣，暮鼓晨钟、松涛莲景令人心境澄澈、流连忘返。感念法师救驾之恩，乾隆拨付金银修缮寺院、重塑佛像金身，御笔亲题寺名“拉马寺”。自此古寺历经世事更迭，文脉香火绵延至今。

“拉马寺”充满烟火生机，是一座“会呼吸”的古刹。院内花草错落、鸟鸣不绝、草木清香萦绕。郓城县佛教协会秘书长、住持妙梵慧(周亚丽)悉心打理寺院景致，禅室墙上“且坐”“禅茶一味”等题字意蕴悠长。此地禅意藏于一草一木、日常点滴之中，让古寺灵动丰盈、生生不息。

驻足古寺，恢弘的仿唐建筑、精巧的榫卯结构尽显匠心风骨。大雄宝殿巍然矗立，叠加两代帝王的传奇典故，为古寺增添神秘底蕴。风铃叮咚、飞燕盘旋，涤荡人心烦忧，让疲惫的灵魂寻得静谧归处。

“拉马寺”既是宗教活动场所，更是历史人文的融合载体。古寺以庄严建筑震撼人心，以清幽环境净化心灵，以禅理智慧启迪世人，指引人们于尘世喧嚣中守住内心的澄澈与平和。

魏建国



打“瞎驴”

儿歌曰：小三妮，当“瞎驴”，转了一圈抓把泥。二小子，蒙上眼，东抓西挠乱了点。“瞎驴”打个滚，抱住了二小的腿。“瞎驴”撒个欢，搂住二妮不松开。“瞎驴”跌一跤，抱住二姐的粗牛腰。

在北方乡村民俗中，打“瞎驴”是流传广泛、接地气的传统儿童游戏，属于摸瞎类经典游艺，承载着几代人的乡土记忆。

这一游戏传承数代，名称源自旧时农家磨道蒙眼拉磨的毛驴，形象直白。以“瞎驴”指代蒙眼参与者，以轻拍挑逗为“打”，满含乡野趣味。

该游戏无需特定场地和道具，村口空地、麦场、院落均可开展，三五人即可游玩。玩法简单固定：通过剪刀包袱锤选出“瞎驴”，用布条蒙眼遮光，其余人在范围内轻拍躲闪、出声逗引。“瞎驴”凭听觉、触觉寻人，抓到他

人后轮换接替，循环游玩。

游戏规则简单，却十分考验孩童的听力、反应与默契，尽显乡村童趣。蒙眼者耳畔满是脚步声、哄笑声，左右扑捉皆落空，同伴穿梭环绕、灵活躲闪，趣味十足。

打“瞎驴”是农耕生活的童趣缩影。旧时物资匮乏，孩童就地取乐，游戏贴合乡土生活。它既是娱乐方式，也是孩童社交健体的途径，在嬉戏追逐中涵养合群机敏的品性，维系邻里情谊。

如今生活方式更迭，街头游玩的场景日渐稀少，但这项民俗游戏仍在庙会、民俗活动中重现，成为唤醒乡愁、联结代际的文化符号。其质朴纯粹的玩乐内核，藏着国人随心寻趣、乐享平凡的生活智慧，承载着浓郁乡土温情。

文/刘伟建 图/王世会

古碑新亭，照见千载开山雪

——单县“开山舊跡”文物出土与文脉传承

夏日，单县开山景区碧水相依、绿荫环抱，张垆堆遗址上的开志亭静静矗立，其掩映下的“开山舊跡”石碑，默默诉说着自身的前世今生。

20年前，单县在新城区修筑舜师路时，意外挖掘出一方刻有“开山舊跡”字样的记事石碑。“开山舊跡”的“开”为古代羌族族名、姓氏，单县先人引义为“平”，《康熙字典》中将“开山”释为“平原上的土丘”；“舊”是“旧”的繁体字，“跡”同“迹”，合为“旧迹”之意。

这一珍贵石刻文物，连同完整留存的《开志亭记》碑文，为考证单县古八景之一“开山积雪”历史渊源、梳理本地文脉传承提供了确凿实物依据，让沉寂于历史尘埃的开山人文史迹重现光彩。

古碑为青石材质，主体保存较为完整。碑身正中竖向阴刻“开山舊跡”四字，笔力浑厚、古朴端庄；右上角留存彭城刘氏篆刻印章，碑侧镌刻《开志亭记》全文，字迹清晰可辨。据地方文史资料考证，该碑为清道光年间刘氏后裔所立，是纪念清代池州知府刘毅归隐开山、诗书传家的重要历史遗存。

据考证，刘毅致仕归乡后，钟情开山清幽风物，择地结庐、潜心吟咏，自号“开山人”，留有《开山诗稿》传世。其逝世后葬于开山张垆堆，后人立碑建亭，定名“开志亭”，以此追念先辈高洁操守与文人志趣，唐续家族崇文重教之风。

长期以来，当地群众熟知张垆堆地名，却鲜

知其为古开山旧址。史料记载，开山坐落于单县古邑东南七里的沙河之畔，三阜连绵、林壑清幽，自古为一方名胜。“开山积雪”位列单县古八景之首，是旧时单父极具代表性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。

古碑现世，厘清了开山地名沿革、人文典故，解开了当地流传已久的“张家的垆堆刘家的林，里面埋着王家的人”民间谜题。考古资料显示，张垆堆历史文脉厚重悠远，遗存可上溯至龙山文化、商周时期，是黄河流域重要的远古聚落遗址。此地历经先民聚居、古人登临、名士归隐、后世赓续，见证了千年文明变迁。

因年代久远，原亭台建筑早已损毁湮灭，古碑深埋土层、字迹漫漶。随着保护性发掘，让千年开山文脉终得重现。文物出土后，单县文旅部门第一时间开展现场保护、文字释读、档案整理等工作，严格按照文保标准对古碑加固修护，原址复原开志亭，实现文物原地保护、景观原貌恢复、文化原地传承。如今，修葺一新的古碑亭坐落于松林绿荫之中，远古遗址的文明底蕴与明清文人的风雅文脉交相辉映。

一碑载岁月，一域续风华。“开山舊跡”古碑重光，既是单县深厚历史文化的生动见证，也是本土文脉传承保护的重要成果。当前，单县持续深耕历史文化资源，活化利用古建古物遗存，让千年开山遗韵在新时代焕发新生，为县域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浓郁厚重的文化力量。

文/图 刘波



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讲」

鲁西南大地民风淳朴、重义守信，朴实真诚是做人的底色。在本地方言中，评价人品只需一字，便蕴藏深厚内涵，普通的“讲”字，最是别具韵味。

不同于普通话中“讲述、言说”的本义，鲁西南方言里的“讲”，是对人品的褒奖，是处世的标尺，专指人讲义气、守规矩、大方厚道、不吝啬。寥寥一字，承载着这片土地千年不变的处世准则。邻里相处、亲友往来、人际交往，但凡人们夸赞一个人人品端正、处事大方得体，总会脱口而出：“这人很讲！”简单四字，分量十足、豪气干云，让人霎时联想到《水浒传》中的晁盖以及众多水浒英雄。若是评价一个人“不讲”，其个人形象便会瞬间崩塌，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“臭哄”。小气抠门、不守规矩、不懂人情世故、待人刻薄、处事不正，都是“不讲”的潜台词。这种品性有诸多表现：他人重情义为“不讲”的人随礼，而“不讲”的人给别人少随礼、不随礼；更有甚者，私吞他人托转的随礼份子钱，事情败露后，人品形象更是一落千丈，用本地方言形容便是“疵毛”。

生活场景最能诠释“讲”字的深意。邻里遇事鼎力相助、不计得失，众人便会赞其“讲情义、真讲”；与人相处大方慷慨、真诚坦荡、不占便宜、不要心眼，便是众人认可的“讲规矩、真讲”。在鲁西南人的认知里，“讲”是做人的根本，是立身行事的底线，远比钱财名利更为重要。这份镌刻在方言里的价值取向，让优良家风、淳朴民风代代相传。

多数人并不知晓，鲁西南方言中“讲”的独特释义，并非近代衍生，而是源远流长，可追溯至战国时期魏文侯的处世典故，《资治通鉴》中便有明确记载，为这句乡土语言赋予了厚重历史底蕴。据《资治通鉴·周纪一》记载，魏文侯尊贤重道、修身立德，拜卜子夏、田子方为师，礼遇天下贤士，尊崇礼法、坚守信义，凭借宽厚正直、守和重信的处世之道折服诸侯。卜子夏，正是孔子的弟子。彼时，韩、赵两国相互敌视，韩国曾向魏国借兵伐赵，魏文侯以“寡人与赵，兄弟也，不敢闻命”婉言拒绝；赵国借兵攻韩时，亦以道义回绝。两国起初心生怨怒，后知晓其心怀公道、不愿邦国征伐、祸乱百姓。书中“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”的“讲”，意为讲信、讲义、守规矩，是秉持道义、处事公允的高尚品德。这份德行让魏文侯深得诸侯敬重，韩、赵臣服，魏国崛起为战国初期强国。

《水浒传》的广为流传，更让“讲”的内涵愈发丰满鲜活。书中梁山好汉多出自鲁西南及周边，立身行事的核心准则正是一个“讲”字。好汉们仗义疏财、扶危济困，慷慨坦荡、守正本心，契合当地人品标准，与魏文侯守和重信之道互为呼应。这是鲁西南人纯粹的处世信条：做人真诚、行事守规、待人宽厚、处世重义，便是至高人品。

如今时代更迭、语言流变，许多方言词汇逐渐淡出生活，但“讲”字依旧鲜活，扎根鲁西南人的日常。一字藏千年文脉、映乡土民风，镌刻着当地人的赤诚坦荡。一句“这人真讲”，是乡土最真挚的褒奖，亦是跨越千年不曾褪色的古道热肠。

张长国